

不要过多地去考虑绘画的本质和局限，在视觉和理念相对统一的作用下，只能让自己仰望绘画世界。我们的创作，其实要让周围所有的人来理解作品的意义，这才是好的作品。把平面转换成想象空间，主要目的是让你创作的思想变成一种动力。我们习惯说的“气息”——生动气势是中国画中最难表现的，也是每个中国画家最难逾越的障碍。

岑其 著

智慧的结累

片蕴其迹

——大德堂文集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片蕴其迹：大德堂文集 / 岑其著. -- 上海：学林出版社，2010.1

ISBN 978-7-80730-940-6

I. ①片--- II. ①岑--- III. ①汉字—书法—文集②绘画理论—文集 IV. ①J292.1-53②J20-53 J2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17317号

片蕴其迹——大德堂文集



著 者——岑其

责任编辑——吴耀根

装帧设计——慈溪市邦艺广告有限公司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81号3楼)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上海钦州南路81号1楼)

电话：64515012 传真：64844088

印 刷——杭州艺文报刊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9×1194 1/16

印 张——9

字 数——25万

版 次——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730-940-6/G.289

定 价——30.00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目录

永恒（代序）		生命能寂寞吗	112
陶渊明概论	4	丽江之行随记	113
周敦颐概论	22	谈绘画创作	115
苏轼概论	28	中国画不能没有笔墨和线条	117
李清照概论	33	我是慈溪人	118
王阳明概论	42	关于故乡画展	121
朱熹概论	50	关于乡恋	123
刘海粟论	62	我与佛的对话	124
元代画坛的领袖赵孟頫	72	会昌之旅	125
倾听悲伤	84	赣州之恋	128
自有惊雷笼宇内	88	感谢人生	129
谈陈之佛	91	《历代诗词精选集》序	130
海派画家四大名旦画集序	94	简述“以锦喻文”的现象	131
永远的怀念	98	享受美丽	133
梅调鼎论	100	汗颜之笔	134
略谈复古	102	热爱生命	135
与画有缘	104	夏愁怎画	136
蠓叟吟	108	画观音记	137
不朽的灵魂	109	我为民族而自豪	138
顾恺之研究	110	后记	

永恒（代序）

我每次经过一座名山，见游人如织，每次都会感受到山川树林里潜藏着不可思议的能量和威胁。每个过客在欣赏美景的同时，大多数会忽略了自己的欲望、心中迫切的需要，甚至根本不会去理解山川对人的诱惑。

清晨，云蒸霞蔚，寂静无声；中午，阳光明亮，蓝天白云伸手可及；晚上，群山似乎非常地接近，它们冷漠、孤单地矗立着，有种奇怪的感觉，仿佛近在咫尺，又宛如广阔而遥远。悠久绵长的大地山川承载着世界的快乐和悲伤，它本身没有思想，但过路的人会觉察到自己的短暂渺小。在你离开人世后，它们会继续存在千年万年，而你带着所有的忧虑、悲伤、快乐、不满逝去。

游人在美的世界中暂时脱离世界，追求自己特殊的天赋或野心、爱好和欢愉，而他们似乎不太明白自己就是这个世界存在的当下。山川永恒存在，而你在这个时段，经过这种短暂，让你暂时寻求山峦以外的东西，因为你自身所没有的永恒、神性与美丽在这里形成对比。溪水沿山谷流泻而下的声音是永恒不变的，而面对的游人天天在变。游人的思想在说明这里的存在，它真的是一种从有到“无”的驱动力，整个世界结构的一部分，相反，却予以游人更多的是失落和困惑。当美丽的山川渐渐地消失在每个人的眼前，这一个个当下的个体是否又在思考生活中所带来的已经积累了很长久的阴影，包括悲伤、失落、压力、恐惧、应酬与争执。

那么，我们要怎样才能摆脱生命旅程中的一切压力、悲伤和争执呢？这与意志力无关，这与财

富无关，这与地位无关。意志力只是行为思想的产物，财富与地位只是暂时捕捉的妄念。过多的妄念会毁灭一个清净的世界，即个人的内心世界。个人，就是世界、文化、社会和经济环境。你就是世界，世界就是你，当你脱离世界，内心深处也一样脱离自我，重要的是，不要以内在和外在来思考人生，而要把生命视为一个整体，我们生命中所有经历的悲伤善恶只能是一个局部。只有在妄念净空的时候，心底才会生出焕然一新的东西，静静地得到快乐。

我们在看山、云、树、水流的过程中，没有任何意图，乃是“自我”的熄灭。在空寂之中享受一份大自然给我们的恩赐和宁静。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是一个执著的个体，所以有虚妄不安的心跳，没有目的的妄念。而永恒的话题只是失去，时间在失去，思想在失去，亲朋好友在失去，人们透过各种神明、某些不受时间拘束的东西以及意识形态与希望来寻找永恒。而找到的永恒全是伤害、欺骗、死亡和苦痛的轮回。

你与青山白云没有任何关系，但你可以驻足聆听它的声音。你在白云之前可以净化自己的心灵，如果你能在山川白云之前可以终止过往的记忆，新的你将会诞生。

我们彼此吸引，就像山川和白云，少一点妄念和目的，爱将之永恒，心灵将之自由和美丽。

2009年7月6日凌晨2:40于九江到宁波的列车上

陶渊明概论

陶渊明（365—427年），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卒后亲友私谥靖节。东晋浔阳柴桑人。陶渊明的出生地，是江州寻阳郡寻阳县，也就是今天的江西九江。后来寻阳县又并入柴桑县，所以也可以说陶渊明是柴桑人。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陶渊明12岁所丧者，庶母也。其生母孟氏卒于陶渊明37岁时。陶渊明401年冬—404年夏在家守丧3年。）

一、陶渊明所处的时代

陶渊明出生时，东晋政权已建立48年。此后东晋王朝又持续了54年，终于在公元419年被刘宋取代。晋宋易代之后，陶渊明还生活了8年。陶渊明的一生经历了三个朝代（东晋、楚、刘宋），十个皇帝（晋哀帝、废帝、简文帝、孝武帝、安帝、桓玄篡位、恭帝、宋武帝、少帝、文帝），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多事之秋，社会动荡不宁，政治极为腐败，军阀连年混战。各种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复杂，整个中国被分裂为十多个大大小小的割据政权。

晋代政治极端腐败，士族大地主掌握着国家的权力和经济，门阀之风盛行，士族地主与庶族地主之间的矛盾也很尖锐。士族豪门和庶族之间的界限也特别森严，政府在选官、识拔人材、通婚等方面都有种种严格的限制，甚至就是车服之类也不可混淆。刘毅所云“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宋书·恩幸传论》），概括了当时的政治特征和用人

标准。

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思想界的矛盾也很突出。儒学、玄学、道教、佛教的驳难辩论非常激烈。反映出分裂的政治局面和动乱苦难的社会思想界的躁动不安。

二、关于陶渊明名字、年岁的异说

关于陶渊明年岁的异说：长期以来，关于陶渊明的年岁，陆续出现过：

- （1）51岁说（清代吴汝纶）；
- （2）52岁说（陶学专家古直）；
- （3）56岁说（梁启超）；
- （4）59岁说（陶学专家邓安生）；
- （5）76岁说（宋代张演）；

（6）63岁说。沈约《宋书》首倡63岁说。沈约出生于公元441年，距陶渊明去世仅14年。其可信度相对较大。故学术界多取63岁说。

关于陶渊明名字的异说：《宋书》作于陶渊明死后六十年，时陶渊明的名字已有异说，或名潜字渊明，或名渊明字元亮。（还有一种说法：陶渊明在420年刘裕立宋代晋后，更名为“潜”。刘程之更名为刘遗民。）可见此事一开始就是疑案。（不但陶渊明的名字说不清楚，他父亲的名字也说不清楚，后面会说到）这也说明陶渊明当时并不被世人所看重。（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根本就不记载陶渊明的事情）因为东晋南朝最重门第，百家之谱皆上之于吏部。陶渊明若属士族，在社会上的地位很

高，沈约修史，根据陶氏家谱，定能明确写出他的“名”与“字”。不致模棱两可，莫衷一是。可见当时陶渊明家族败落困窘之状。

东晋时期，讲究门庭家世。夸宗耀祖一时成为风尚。陶渊明也未能免俗，在《命子》一诗中，他将家谱上续唐尧、虞舜，将西周司徒陶叔、汉右司马陶舍、丞相陶青都纳入本族谱系。这种追溯远祖的做法对于研究陶渊明本人并无实际意义。但应该看到不止是东晋时期，整个中国社会，从来就是夸宗耀祖。如屈原在《离骚》的开头中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就是这种写法。唐太宗自认是老子的后代，陆游自认是楚狂人陆舆的后代。这和“祖宗崇拜意识”有很大的关系。因此，陶渊明《命子》一诗中，将家谱上续唐尧、虞舜等，也是可以理解的。他是要通过赞扬祖辈的传统品德，期望儿子继承发扬祖辈的光荣风范，这些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可以说，这种追溯远祖的习俗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特质。当然，从消极方面来说，也是20世纪中叶血统论的历史渊源。

陶渊明确切的家世应从他的曾祖父陶侃述起。陶侃（259—334年），活了75岁。字士行，古饶州人（今鄱阳县人），后徙家浔阳。侃出身孤贫，以军功而达显贵，官至八州都督，封长沙郡公。

说到陶侃，必然会说到陶母：

陶侃母亲湛氏（243—318年），也活了75岁。中国古代四大贤母之一（四大贤母是：孟母、陶母、欧阳母、岳母）。古代饶州（今江西省鄱阳县）人。陶母以身垂范，育子成才的事迹，千古传颂。

其典型事例有：“截发延宾”、“责子退鲈”等。

一分为二论陶侃：

陶侃自幼孤贫，后来由县吏积功渐升至荆州刺史，长沙郡公，都督八州诸军事。陶侃从政治军，

四十年如一日。

他性情聪明敏锐、恭敬勤奋，整天正襟危坐，对军府中众多事务检视督察，无所遗漏，没有一刻闲暇。他常常对人说：“大禹这样的圣人，尚且珍惜每寸光阴，至于一般人，更应当珍惜每分光阴。怎能只求逸游沉醉，活着对时世毫无贡献，死后默默无闻，这是自暴自弃！”他绝不容忍他的部下醉生梦死。“博具投江”在当时就是很有影响的一例。当时陶侃的参佐幕僚中有些人因酗酒、赌博而荒废正务，陶侃命人收取他们的酒具和赌博用器，全都投弃江中，将吏们则加以鞭责，说：“这些东西乃放猪的奴仆们玩的！《老子》、《庄子》华而不实，不符合先王修身治国的言论，是不能用来实践的。君子应当端正他的衣冠，整理他的威仪，哪有蓬头、光足、诟面却自以为是不拘小节，心胸旷达的呢！”因此，终其一生都勤政为民。直到告老还乡时，仍然把所管军政事务整理有序，军资财物清理登记，封存府库，清楚移交他人。在他管辖的地方，老百姓安居乐业、路不拾遗。老百姓对他也十分感激，当时人们评价陶侃是：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

陶侃的另一面：陶侃也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廉洁，《晋书·陶侃传》载：“媵妾数十，家僮千余，珍奇宝货富于天府。”陶侃有十几个女儿，十七个儿子。

陶侃亡故后，其子嗣或因罪被诛，或自残而歿，衰败相继，家境急剧沦落。

陶渊明祖父陶茂虽也做了个不大不小的太守，但没有什么事迹流传下来。

有一点值得一提：陶渊明可能系出陶侃衰落之一支。《晋书·陶侃传》记侃有十七子，但仅有九个名字留下来的。（侃有子十七人，唯洪、瞻、夏、琦、旗、斌、称、范、岱见旧史，余者并不显。）而据陶渊明自叙，其祖父名茂，在九人之外。可见其祖父是陶侃诸子中成就较低者。在东晋

南朝，同族之内，也从官宦高低来区分社会地位的高低。祖父陶茂尽管曾官至太守，父亲亦曾出仕，但是始终是地位不高的官职，而在他年幼时父亲就去世了，由此来看，陶渊明成年时家道已经衰落。东晋南朝士族子弟出仕年龄一般在二十岁左右，由其出仕时二十九岁，以及任江州祭酒来看，陶氏在陶渊明那个时代，充其量也只能是一地方小族而已。尽管陶氏为东晋元勋之后，还是无法使陶渊明出仕一路畅通。这大概就是陶渊明在当时被忽视的原因。

陶渊明父亲何名，史料记载不一。宋代李公焕注陶诗《命子》，引用《陶茂麟家谱》云：“（陶渊明）父名逸，姿城太守。”而明清的各种陶氏家谱，如《浔阳谱》、《栗里谱》、《西源谱》、《定山谱》，则称其父名为陶敏，任安成（可能是安城，即今江西安福一带）太守。史料载，他父亲有正室，还娶了偏室。由此可证，陶渊明童年的时候，家庭生活尚宽裕。陶渊明于义熙元年（405年）41岁时所作《祭程氏妹文》，就提到了他12岁的时候，庶母去世。陶逸，是否做过安城太守今尚存疑，陶渊明对陶侃以上的先祖都具体提到职位，但谈起他父亲时却非常空泛，估计是其父职位卑微，耻于言及。加之陶逸去世很早，到陶渊明一代，败落困窘之状可想而知。

陶渊明无亲兄弟，只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比陶渊明小三岁，后嫁给程姓人家。

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曾被都督六州诸军事并领江、荆、豫三州刺史，庾亮保举为儒官“劝学从事”，又作为征西大将军的长史。孟嘉的妻子，是陶侃的第十个女儿。孟嘉温雅平和，飘逸潇洒，对陶渊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孟嘉的第四个女儿就是陶渊明的生母。

陶渊明除同父异母妹妹外，还有两个叔伯兄弟：仲德、敬远，都无所作为。并30多岁就早逝。

陶渊明有五个儿子：陶俨、陶俟、陶份、陶

佚、陶佟（五个儿子的小名依次为：舒、宣、雍、端、通。前四子为原配夫人所生，其中三子陶份和四子陶佚为双胞胎）。

众说纷纭的陶渊明《责子诗》：“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艺。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写这首诗时陶渊明44岁，其年代是在晋义熙四年（公元408年）。

对此诗的几种说法：

1. 嗜酒——遗传——智商：陶渊明一生好酒，5个儿子都是“弱智”，他在《责子诗》中说“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艺；雍端年十三，不知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陶渊明到了晚年时，也已觉察到儿子的平庸无能，是自己长期酗酒所造成的。他写道：“后代之鲁钝，盖缘于杯中物所贻害”，“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饮酒诗》末首）。

2. 我辞官——儿子都不爱读书——也做不了官——正合吾意。

3. 虽然诗题名为责子，其实反映的是亲子之情，是一种拳拳爱心。他在诗中显得语气舒和，含有戏谑和自我解嘲的意味。黄山谷的评语：“观靖节此诗，想见其人慈祥戏谑可观也”。

陶渊明的经济状况：关于陶渊明的经济状况，历来争议较大。我觉得，还是应该通过对陶渊明作品的分析来认识才比较客观。

首先，陶渊明绝不像有些人所说的“穷到彻骨，常常没有饭吃”（梁启超《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他家在农村还是有一些产业的。《归园田居》的第一首就明明白白写着：他家拥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除了住宅旁有十多亩田地，从他的作品中还可以看到，他家还拥有几

处田产，即：“西畴”、“南亩”、“下噍田”等。不仅如此，陶渊明归隐后，又带领家人开了不少荒地，还是在《归园田居》中，他说：“开荒南野际……我土日已广。”从陶渊明自己的诗文来分析，他家应该有几十亩田地，并且在柴桑、上京、南村等地都有属于他自己的住所。这在当时是很不错的了。

除了田地和房产，从《感士不遇赋》的序文中可知，陶渊明还有教授门徒的“讲习”收入。不要小看这项收入，当时，稍有名气的文人，收起门徒来，都是“数百”甚至“上千”。这些，《晋书》上都有记载。凭陶渊明的名气，估计所收的门徒也不会少。

概括地说，陶渊明出身于一度辉煌而急剧败落的官宦世家。他的一生，经过了“猛志逸四海”的少年时代，经过了“以心为形役”青年时代，经过了“觉今是而昨非”的中年时代，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无我境界。隐居生活中经历了各种困苦饥寒，却能“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到临死前更已攀登到“不喜亦不惧”的最高境界。

三、时仕时隐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陶渊明的一生经历了三个朝代，十个皇帝。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多事之秋，社会动荡不宁，政治极为腐败，士族大地主掌握着国家的权力和经济。同时，门阀之风盛行，士族地主与庶族地主之间的矛盾也很尖锐。士族豪门和庶族之间的界限也特别森严，政府在选官、识拔人材、通婚等方面都有种种严格的限制，甚至就是车服之类也不可混淆。“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宋书·恩幸传论》），概括了当时的政治特征和用人标准。

士族的权势之大、气焰之盛，连皇权也不能完全控制。晋武帝司马炎时，士族王恺、石崇斗富，

石崇对司马炎资助给王恺的一支二尺多高的珊瑚树不屑一顾，随手打碎，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士族的奢侈和至高无上的地位。

军阀连年混战。各种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复杂，整个中国被分裂为十多个大大小小的割据政权。就东晋政权而言，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不断发生，而且愈演愈烈。那时人民的生活也是十分艰难的，当时的豫章太守范宁上任前曾向皇帝上疏：“古者使人，岁不过三日，今之劳扰，殆无三日休停。”（《晋书·范宁传》）如此苛严的役赋搞得天怒人怨。

陶渊明19岁（383年）那年，以谢安为首的东晋军队击败了一心想吞并江南的前秦苻坚的百万大军，并且乘机进兵北伐，一度恢复了徐、兖、青、司、豫、梁六州，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淝水之战后，东晋王朝偏安于江南一隅的局面得以暂时稳固。年青的陶渊明也一度异常振奋，对国家前景和个人命运萌生了希望。可是这种因胜利而稳定的局面伴随着公元385年谢安的辞世而宣告结束，昙花一现，盛景难再。东晋政权落入极端昏庸的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手中。

399年，会稽郡爆发了反对司马元显强征兵役的孙恩起义。当时扬州七郡人民同时响应，声势浩大，会稽、吴兴、义兴等郡皆为孙恩占据，孙恩不久失败。孙恩兵败后，其妹夫卢循继之，坚持斗争达12年之久。农民的反抗，门阀显贵之间的争斗使东晋王朝一如被蛀空的大树，在风雨中摇摇欲倾。

此时，桓玄势力不可一世，他击杀殷仲堪，占领荆州，并于晋安帝元兴元年（402年）领兵东下进入建康（南京），次年强行篡位，自称皇帝。改国号为楚。

以平定孙恩起家，攻击桓玄自大的刘裕又成了一个更大的集政治、军事大权于一身的暴发户，他虽然在北伐收复失地中有所建树，那实际上是为他篡晋自立捞取政治资本。于是，在公元

420年，刘裕废掉了晋恭帝自立为帝，称宋武帝。

陶渊明的一生就是生活在这样政治环境中。陶渊明年轻时也曾有大济苍生的凌云壮志，他说自己“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这些诗句表现出何等的豪气干云，陶渊明幼时受的是儒家教育，有匡济天下之志是可想而知的，可惜在当时政治黑暗的种种限制下，他的“壮志”根本无从实现。

陶渊明一生有五次出仕五次归隐的经历。从太元18年（公元393年）初次出仕到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辞去彭泽县令，首尾十三年。所以他在“归园田居”诗中曰：“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其间的经历大体是这样的：

一仕：陶渊明作为一个没落贵族的子弟，要想在士族门阀横行的社会里实现大济苍生的抱负不过是一厢情愿。正因为如此，他才迟迟不得取进仕途的机会。将近而立之年。耳闻目睹，丑恶的社会现实已经使陶渊明不再像少年时代那样充满憧憬地幻想了。但是，他不甘心将满腹才华湮没蒿蓬。二十九岁这年，陶渊明一方面为生计所迫，另一方面也想找机会施展自己的才能，于是第一次出仕了。《宋书·隐逸传》很简单地记录了他的第一次出仕：“起为（江）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祭酒”在古代是主管国子监或太学的教育行政长官。战国时荀子曾三任稷下学宫的祭酒，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校长。而陶渊明所担任的“州祭酒”则不仅仅是管教育的。据《宋书·百官志下》记载：“晋成帝咸康中，江州又有别驾祭酒，居僚职之上。”“（州）祭酒分掌诸曹：兵、贼、仓、户、水、铠。”也就是说州祭酒掌管着一州内，兵戎、治安、田租、户口、祭祀、农桑、水利、兵器等，是州中一个举足轻重的职位，而不是掌管教化。

可见，当时“江州祭酒”在地方官职中还是比较高的。以常人之见，陶渊明第一次出仕能获得这个职位已经很不错了。倘能苟且，虽然谈不上锦衣玉食，但养家糊口还是绰绰有余。但是，陶渊明生性刚直耿介，他看不惯顶头上司江州刺史五斗米道徒王凝之和周围的那些庸吏。五斗米道是道教最早的一个派别。据史书记载，在东汉顺帝时期，由张道陵在四川鹤鸣山今成都市大邑县北创立。据《后汉书》、《三国志》记载，凡入道者须出五斗米，故得此名，因又称为“米巫”、“米道”。五斗米道初入道者称为“鬼卒”，骨干称为“祭酒”。王家世奉五斗米道，五斗米道将其信徒区别为鬼卒、鬼吏、奸令和祭酒四个等级，祭酒是最高等级，在五斗米道中有极高的地位。陶渊明为江州祭酒是太元十八年，这时江州刺史是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王凝之是个狂热的道教徒，据《晋书·王羲之传》载：王凝之任左将军、会稽内史时，孙恩攻会稽。王凝之在军事上不设防，只拜请所谓的“鬼兵”。他对将佐们说：“吾已请大道，许鬼兵相助，贼自破矣。”就是这一次，会稽被孙恩攻破，王凝之被杀。

王凝之既是这么一个狂热的信徒，他让江州祭酒拥有重权是有道理的。

那么，王凝之为什么能把这么一个在州中举足轻重的职位，委任给初次出仕的陶渊明呢？我同意有些学者的观点，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据国学大师陈寅恪考证，浔阳陶家亦世奉五斗米道，也就是说，王、陶两家有共同的信仰。其二，浔阳陶氏到陶渊明这一辈，再怎么衰落，在江州也是一个名门之后；再说，虽然陶侃只是陶渊明的曾祖父，按中国传统观念，直系血亲要追溯到高祖父母辈，就是说他们还在直系之内；陶侃去世是在咸和九年（334年），陶渊明任江州祭酒是太元十八年（393年），相隔不到60年，他们之间的关系尚不至于被人淡忘；从史载人物来看，在这之前，浔阳陶氏

除陶渊明的祖父和父亲曾做过太守外，陶渊明当时尚在世的母亲，还是东晋名士孟嘉之女。综合上述诸多原因，按事理逻辑推论，王凝之完全可能，也可以对陶渊明委以重任。陶渊明来自无拘无束的田园，官场中的百般禁戒使他难以忍受。官吏们彼此间尔虞我诈，谄上骄下的种种丑态又让他感到厌恶。再加上面对的又是这样一个昏庸的顶头上司，使他觉得自己是置身在污浊的泥潭之中，不仅抱负无从施展，就连洁身自好也难以做到。与其和这帮庸人周旋，莫如抽身返乡躬耕田园。

陶渊明“少日自解归”后，又被召为州主簿。主簿在吏职中与府主最为亲近，有“股肱近臣”之誉。至魏晋，已居重臣幕僚之右，参与机要，总领府事。被认为“（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晋书·郝超传》）。王凝之能委任陶渊明这么一个重要的职位，说明对他既非常看重也非常信任。可陶渊明对王凝之已无好感可言，拒不应召。解职后，“躬耕自资”，在家闲居了六年。这期间次子陶俟、三子陶份、四子陶佚相继出生。394年，原配夫人不幸去世。家里境况明显今不如昔。一年后，续娶翟氏。399年生五子陶佟。

二仕：399年桓玄任江州刺史兼荆州刺史。这一年，三十六岁的陶渊明再度出仕，在江陵桓玄幕府任职。这次渊明距离初次出仕已有七个年头。

关于陶渊明的第二次出仕，有两个问题要讲清楚。

1. 陶渊明为什么去投奔桓玄？

桓玄（369—404年）东晋末期桓楚国建立者。桓玄是东晋名将大司马、南郡宣武公桓温之子。陶渊明之所以去投奔桓玄，应该有三个原因：一是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与桓玄之父桓温关系密切，私交甚好，并担任过桓温的长史。这种家族的友谊，使得陶渊明到桓玄处求仕。二是桓玄早期在社会上的口碑并不坏，据《晋书·桓玄传》载，说他“黜凡佞，擢携贤，君子之道初备，京师欣然”。三是陶

渊明十分赞成桓玄对佛教思想的否定以及对当时寺院泛滥的限制。很可能是由于以上原因，陶渊明认为桓玄是一个值得投奔和辅佐的人。

2. 桓玄重用了陶渊明吗？

陶渊明一投奔桓玄，桓玄就接纳了他并委以官职。可见，桓玄对陶渊明还是比较客气的。同时也还比较器重他，任职不久，就派他赴京都办公事。尽管一路上风尘仆仆，非常辛苦，使他对官场厌倦，但陶渊明还是认真地把公事办完了。并且这次是陶渊明五次出仕中在官场里停留时间最长的一次。前后三年。这次离开桓玄的原因也还比较实在，确因生母孟氏去世，孝子必须返家居丧。我不同意有些人的观点，认为陶渊明有先见之明，看出桓玄想谋反篡位，怕受牵连，所以主动离去。当然，我也不同意另一种观点，认为陶渊明曾做过篡夺帝位的桓玄的幕僚而成为他人生的一个污点。

事实是401年冬，陶渊明的生母孟氏去世，陶渊明回乡居丧。此后，一直到404年仲夏以前，陶渊明一直居丧在家。

正是在这期间，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403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改国号为楚，以“永始”为元年。将晋安帝贬为“平固王”，幽禁于浔阳。（《晋书·安帝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三）。此时的陶渊明正在家乡躬耕自资。

对桓玄称帝之事，陶渊明是持否定态度的。就在桓玄称帝后不久，陶渊明写了《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一诗。其中“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平津苟不由，栖迟诎为拙！寄意一言外，兹契谁能别”等诗句，就曲折地表达了他对桓玄称帝之事的厌恶与不屑。

正是这种态度，才引出了他在三仕之初的表现。

三仕：元兴三年（404年），陶渊明40岁。这年二月，刘裕起兵讨伐桓玄。三月，刘裕的军队击败桓玄后进入建康城，并被推为镇军将军。四月，刘裕又在湓口大破桓玄的部队。攻下浔阳。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晋书·安帝纪》、《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三）。

五月以后，陶渊明东下赴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投奔刘裕。担任刘裕的参军。开始了他的又一次仕宦生涯。

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抗争的意愿。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谧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所以，他在刘裕幕中呆了不到半年，便一无所获地离去，结束了他的第三次仕宦生涯。

四仕：离开刘裕后，义熙元年初（405年），陶渊明转到当时驻守浔阳的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处任参军。开始了他的第四次出仕。不久，晋安帝复位，这年的三月，他奉命赴都（建康）。关于陶渊明这次赴都的任务，清代学者陶澍认为主要

有两个：一是“奉贺复位”；二是“为刘敬宣上表求解职”。赴都途中，陶渊明写了《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一诗。在这首述怀诗中，诗人一方面表达了对于平定桓玄之乱的肯定与欣喜；另一方面，再一次表达了他厌恶官场，向往田居的“素志”。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

五仕：405年8月，（41岁）陶渊明经叔父陶逵介绍出任彭泽县令，陶渊明为彭泽县令的原因，据肖统的《陶渊明传》载：“谓亲朋曰：‘卿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可见，陶渊明做县官的目的只是为隐居田园讨碗饭吃。况且当县令赚取隐士资金，是封建士大夫退却的一种传统方式。从东汉起，已经有了这种例子。东晋末更多。如与陶渊明并称“浔阳三隐”的刘遗民，其隐居方式也如此。这说明从县令过渡到隐士是当时盛行的“隐风”，而且陶渊明把自己的目的也说得明明白白，即为以后归隐找点资金。

到任八十一天。11月，程氏妹卒于武昌。又因“岁终，会郡遣都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赋《归去来》”。“征著作郎，不就”（肖统《陶渊明传》）。从此他终生不再出仕，一直在农村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

陶渊明决心归隐并非偶然，他39岁时，写下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中说：“瞻望邈难逮，转欲患长勤……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中也云：“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他在《饮酒》中也云：“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余。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可知陶渊明终究要返回田园的，且归田园之心由来已久……由此观之，陶渊明辞彭泽令，督邮不来，程氏妹不丧，陶渊明也会归隐，督邮至和妹丧，实为托辞。

陶渊明冷静地分析了自己的人生与心路历程，

认识到自己不适为官和不愿为官的本性，否决了寄于仕途的一切考虑与幻想，择定了故乡田园作他永远的安居之所与精神家园。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出仕。

陶渊明从二十九岁第一次出仕，至四十一岁彻底回归，前后经历了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陶渊明虽然五次从政而又五次归隐，每次短暂的官场生活，自一开始就充满着矛盾和无奈，刚踏上仕途，就忆念着故园亲老，隐居读书的自适；从来没有在官场中寻求到适当的位置，永远在迷茫和奔波中，个性和人格受到煎熬，总是在呼唤田园梦幻。这种仕与隐的冲突，一心处两端的痛苦如影之随形，挥之不去，折磨咬啮着陶渊明的心灵。只有在辞去彭泽县令，永诀官场之后，他才真正获得了精神放松，思想解脱，遂了夙愿，永远守住丘山。这是以艰难痛苦的生活为条件而换来的自由闲适。

四、彻底归隐

陶渊明405年彻底归隐，427年去世。共22年。

辞去彭泽令后，陶渊明开始了完全归隐的躬耕生活。此间，他进行了大量的诗歌创作，主要为田园诗和咏怀诗，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或咏农事艰辛，或咏邻里友情，或感慨时事，或抒发时光易逝，功业无成的矛盾心情，或借古讽今，表示对现实的不满。他的生活和思想亦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渐进过程，其大致可以分为归隐初期和归隐晚期。

归隐初期，陶渊明的生活还算安宁自得，有时闲居乡里，有时登高远游，有时也躬耕陇亩。这亦是他人生的最主要的诗歌创作时期，其间，他创作了大量的田园诗和咏怀诗。

这一时期，陶渊明的田园诗有的是通过描写田园景物的恬美、田园生活的简朴，表现自己悠然自得的心境。或春游、或登高、或酌酒、或读书、或与朋友谈心，或与家人团聚，或盥濯于檐下，或采菊于东篱，以及在南风下张开翅膀的新苗、日见茁壮的桑麻，无不化为美妙的诗歌。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生活尚可。这种状况，可以从他的诗《归园田居（其一）》中看到，诗云：“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归园田居》共五首。这一首与另一首《种豆南山下》都是陶渊明归隐之初的代表作。

在这首诗中，陶渊明坦诚地倾吐了对过去仕途生活方式的鄙弃，和退隐归田、从自在中寻找新的生命价值的肯定。也表达了他与世俗不合，热爱自然、崇尚真朴的性格。他把求取功名进入仕途看作是“误落尘网”。在他看来，只有回到了田园中，内心才充满了得到自由的幸福感。诗人用“羁鸟恋旧林”和“池鱼思故渊”来表达自己对园田故居的依恋。他在诗中细腻生动地描绘了园田居的农家风貌。虽是极平常的景物，却代表着农村景象的典型特征：宅院、茅屋、榆柳、桃李，远处的村落，袅袅的炊烟……特别是“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两句，就更具生气。作者的本意并不在写田园景物之美，而在于田园生活之趣。洋溢着诗人归田后所体味到的农村生活的情趣。诗人为何对农村的平常景物产生这样的感情呢？诗的最后两句回答了这个问题：“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正因为过去有那种如在樊笼的生活，才能懂得这种自由自在的

生活之可贵。这里的生活尽管简朴，但是和那种充满机诈的、虚伪的、喧嚣的生活相比，它宁静，适意，自然，更符合陶渊明的生活理想。

可是，好景不长，义熙四年，（408年，陶44岁）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迁至栗里（今星子县温泉栗里陶村），生活就较为困顿了。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

在陶渊明归田隐居的晚期，虽然他也参加一些农事劳动，但是他的体力劳动在其经济生活中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他的生活水平得不到保障，如在《乞食》中写道：“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此时的陶渊明生活已经是贫病交加，沦落到向里人乞食的地步了（尽管实际情况并没有这么严重，但起码是大不如前了）。于是，他写了自己的穷困和农村的凋敝。如《归园田居（其四）》：“徘徊丘垄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途。”通过这些诗可以隐约地看到，在战乱和灾害之中农村的面貌。此外，由于他年事已高，身老体衰，于是开始缅怀过去，感叹未来之渺茫。如“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杂诗》其二），“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杂诗》其一）等等，都抒发了诗人对光阴荏苒、壮志难酬、前途渺茫的忧惧。

在他归隐初期，他一方面过着隐居躬耕的生活，另一方面，他的心情却很不平静：“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他在诗里一再描写隐居的快乐，表示隐居的决心，如“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其九）；“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

（《饮酒》其四）；“群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读山海经》其一）。这固然是他真实的感受，但也可以视为是他回避矛盾，力求超然物外而忘怀现实痛苦的精神抚慰。

他没有完全的归于“沉寂”。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是一个”，又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陶公的归隐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对现实的逃避，而是将自己难酬的壮志寄寓在了最能言其志的诗文里，他那“济苍生”的理想犹如一团永不熄灭的火燃烧在他心中。

归隐后的陶渊明作了大量的田园诗歌，用来表达他归隐生活的恬淡放达。如《归园田居》和《饮酒二十》等等。其中“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描绘的人与自然和睦相处，相与为一的境界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旷达心境，将心远世俗，悠然自在的隐士生活推向了美的极至。我们仿佛看到一个远离世俗，乐天知命的五柳先生。但这只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桃花源记》和《咏荆珂》、《咏山海经》等诗文的出现，正展示了陶渊明无法忘怀心灵的痛苦而又心系天下的另一面。他在《咏荆珂》中写道：“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歌颂荆珂壮举的同时，也为荆珂的失败感到惋惜，这种惋惜带着惺惺相惜的情愫。在其《咏山海经》等一些咏史书中，“猛志”一词多次出现（如“邪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都表明，那一股济世的热流，始终贯穿他的一生，平淡自然的生活中也未能掩住这股热流的涌动。痛苦，依然存在。

于是，一个类似于乌托邦的“桃花源”在这种心境下诞生了。那“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黄发垂髫，怡然自乐”的社会成为陶渊明寄托理想的心灵寄托，可是，这样的社会是他一生无法企及的。

鲁迅先生曾说“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人看”。而《桃花源记》正是幸福掩盖下的悲剧。

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不过，他之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你）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粱肉，被他挥而去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五、嗜酒人生

陶渊明嗜酒是出了名的。在今存的一百二十余首陶诗里，描写田园风光、劳动的，略有十来首；而咏酒的，却有六十多首，占一半还多，其中《饮酒》组诗就有二十首！在他一百一十四首五言古诗里，“酒”字出现了三十一、“醉”字出现了七次。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他的《饮酒》20首以“醉人”的语态或指责是非颠倒、毁誉雷同的上流社会；或揭露世俗的腐朽黑暗；或反映仕途的险恶；或表现诗人退出官场后怡然陶醉的心情；或表现诗人在困顿中的牢骚不平。其中的第五首是最脍炙人口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此诗生动地描写了乡居自然环境的清幽、生活的闲适和心境的旷达。最后两句话，此情此景，想说出其中的真意，却忘记

该用怎样的语言来表达了，一种醉后陶然自乐、忘我返真的心绪跃然纸上。

他在《五柳先生传》中便谈到自己是这样好酒的：“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有人）置酒招之。造（到）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不以为意）去留。”（陶渊明本性爱喝酒，可是家里穷不能经常得到。亲朋故旧知道这种情况，有时就置办酒招他过去，他只要去饮酒就一定会喝完，目的是一定要醉。醉了以后就回去，一点也不收敛自己的情绪。）

他在去世前最后给自己写的《挽歌诗》还在说：“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也就是说，临死前他留下的唯一的遗憾是——这辈子酒还没喝够。

陶渊明酒趣颇多，录数例如下：

“王弘令陶潜故人斋酒，要潜于栗里。潜有脚病，使一门生二儿举篮舆。及见，欣然便共饮，俄顷弘至，亦无忤也。”

九月九日 陶潜无酒，出宅边菊丛中坐久之。逢王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后归。陶潜不解声音，而畜素琴一张，每有酒，辄抚弄以寄意。潜素真率，郡守候潜，酒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毕，还复著之。”

这段话的现代意思是：王弘请陶潜的老朋友置酒食，邀请陶潜到栗里（来）。陶潜有脚病，（王弘）特派一门生和二位差人用竹轿将他抬来。等到与故友相见，就很高兴地喝酒。过一会儿王弘（才）到，与陶潜的关系并没有什么抵触。

九月九日 陶潜（家）没酒了，走出家门独坐在屋边的菊花丛中很长时间，恰逢王弘送酒来，马上就地喝起来，（直到）醉后方归。陶潜不甚理解音律。然而却收藏素琴一张，每当有酒，总是抚奏素琴以寄托他的胸臆。陶潜平素真诚坦率。九江郡太守探望陶潜，（正好）遇到（新）酒酿熟，（就）取下头上的葛巾，拿来滤酒，（滤）完，又

戴回到头上。

陶渊明酒中之趣：豪爽、真诚、坦率。

他在《归去来兮辞》的“序”中甚至说他求官的目的只是为了“公田之利，足以为酒”。

彭泽县令，是他仕途生活中的最后一任官职。萧统说他由于生活所迫，不得不去当彭泽令。衙门有公田。他一到任，就下令将公田悉种秫以为酒料，连吃饭的大事都忘记了。甚至为了种秫酿酒，不惜家人口食与妻子争执。这件事，在萧统的《陶渊明传》中有详细的记载：“公田悉令吏种秫，曰‘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因请种秬，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秬。”（注：秫，即今糯稻，有粘性，可酿酒；秬，同粳，较少粘性，不可酿酒。）

可见，还是在他妻、儿的力争下，才分出一半公田种粳稻。解决一家人吃饭的问题。弃官回到四壁萧然的家，最使他感到欣喜的依然是“携幼入室，有酒盈樽”。

在他的隐居地，当年诗人醉后高卧的地方，有一巨石，人称“醉石”。登上这块高约三米的巨石，平滑的石面稍倾如台，可容十人，上刻“归去来馆”四个大字。据《南史》记载：“先生弃官归，时往为庐山中，醉辄卧石上，其石至今有耳迹及吐酒痕焉。”这种说法，当然不可信。细观石上，除了长年因风雨剥蚀而留下的斑痕以外，“耳迹”、“酒痕”是找不到了。石上可清晰读出的只有明人留下的一首《题醉石》的刻诗：“渊明醉此石，石亦醉渊明，千载无人会，山高风月清。石上醉痕在，山高风月清。泉石晋时有，悠悠知我心。”

陶渊明为什么会如此嗜酒呢？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分析：

1. 借悠然饮酒，寄激愤之情

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云：“语时事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吾观其意不在

酒，亦寄酒为迹者也。”陶诗中有不少篇章，就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如“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饮酒三》）；“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饮酒八》）；“一世皆尚同，愿君泗其泥”；“有时不肯言，岂不在伐国”（《饮酒十八》）；“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等。揭露了社会的黑暗，世道的沦丧，表现了自己卓然独立、高洁坚贞、不合流俗的人格。他称当时的社会，“巨猾肆威暴，钦觏违常旨”（《读山海经·十三》），“阊阖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感士不遇赋序》），而自己只能“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所以，陶渊明的饮酒绝对不是一种“悠然”，而是寄托了不少愤激的感情。

2. 韬晦免祸

陶渊明的饮酒也是他用来韬晦免祸的手段。

《晋书·阮籍传》云：“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这样的例子当时很多。可见，饮酒在当时被人们普遍视为一种方法，用来躲避政治上的迫害和人事上的纠纷，而且有些人的确收到了预期的效果。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陶渊明不免有时会发出愤激之辞，而既有不满，便可速祸。所以诗人写道“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一士常独醉，一夫终年醒，醒醉还相关，发言各不领”。即使别人对自己有劝仕或迫害的意思，但自己既然常醉，彼此就无法畅谈，只有“发言各不领”了，这正和钟会问阮籍以时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一样。如果偶有失言，“君当恕醉人”，他也可以请求别人谅解。从这方面讲，他的饮酒也是为了逃避，借酒来韬晦免祸，采取消极的“独善其身”的方法，洁身自好地退隐。

3. 解脱苦闷与彷徨

陶渊明的饮酒还表现了他对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感慨。陶渊明处于晋宋易代之际，诗中这

类感慨是很多的。比如《形影神》：“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杂诗·一》：“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归田园居》：“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九日闲居》：“世短意常多，斯人乐久生。”而《饮酒诗》二十首中，这类表现则更多，如“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逝”，“吾生梦幻间，何事继尘羁”，“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面对如此多的苦闷与彷徨，他的解脱方法就是“饮酒”，自我麻醉。“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饮酒序》）。“忽与一樽酒，日夕相欢持”，故而“不觉知有我”。但这种解脱方法实在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方法，因诗人心里已经充满了忧患之感了。他在求得暂时解脱的同时，更多的是内心的痛苦，所以他的终日饮酒，实在是一件最不得已的痛苦的事情。

陶渊明以酒入诗，把酒和诗直接联系起来，从此酒和文学发生了更加密切的关系，对后来诗人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像唐朝的很多诗人，特别是李白，我们吟诵他们的诗，自然会想到陶渊明。

六、陶渊明评析

陶渊明的作品并不多，诗歌125首，文章12篇（其中：辞赋3篇、韵文5篇、散文4篇，共计12篇）总共15788字。可是却流传了1600年。并且还将继续流传许多个1600年。

纵观历史，历代的名人，从颜延之开始，萧统、沈约，唐代的李白、王维、杜甫、白居易，宋代的欧阳修、苏轼、辛弃疾、陆游、朱熹，晚清的梁启超、王国维、龚自珍，以及“五四”运动后的鲁迅、朱自清、朱光潜等人都对陶渊明给予了相当高的正面评价。

陶渊明去世后，他的至交好友颜延之，为他写下《陶征士诔》，给了他一个“靖节”的谥号。颜延之在诔文中褒扬了陶渊明一生的品格和气节。

梁朝的昭明太子肖统，对陶渊明的诗文相当重视，爱不释手。肖统亲自为陶渊明編集、作序、作传。《陶渊明集》是中国文学史上文人专集的第一部，意义十分重大。肖统在《陶渊明集序》中，称赞“其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如之京”。

南朝时期，陶渊明的诗文作品，流传越来越广，影响越来越大。

到了隋唐时期，有越来越多的诗人喜欢陶渊明的诗文，对陶渊明的评价越来越高。

初唐王绩是位田园诗人，他像陶渊明一样，多次退隐田园，以琴酒自娱。其《醉后》诗道：

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

百年何足度，乘兴且长歌。

唐朝的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对陶渊明十分崇拜，他在《仲夏归汉南寄京邑旧游》中写道：

赏读《高士传》，最佳陶征君，目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

李白更是仰慕陶渊明的人品和诗作。在《戏赠郑溧阳》中写道：

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

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

清风北窗下，自谓羲皇人。

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

李白那种“安能催眉折腰侍权贵”的思想，和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杜甫在安史之乱之后，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把陶渊明引为知己，他在《奉寄河南韦尹丈人》中写道：

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

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